

城市贫困人口个人特征对社会网络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

李汉宗¹ 贺寨平²

(1.武汉大学 社会学系,武汉 430072; 2.天津师范大学 社会学系,天津 300387)

【摘要】通过对天津市抽样调查所获得的528个城市贫困人口的资料的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城市贫困人口个人特征对社会网络结构普遍没有影响:(1)性别、年龄和职业等级对网络规模和网络异质性均没有影响;(2)教育程度对网络规模、网络关系构成、网络趋同性和网络异质性均没有影响;(3)婚姻状况对网络规模、亲属关系和网络异质性没有影响;(4)个人收入对网络规模、网络关系构成、网络趋同性均没有影响;(5)个人特征对社会网络结构变量的影响在其他许多方面也不显著。

【关键词】社会支持网;城市贫困人口;个人特征;网络结构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997(2010)01-0072-06

一、研究主题和文献对照

社会网络分析是一种结构性的分析方法,是一种研究信息、物品和位置等资源通过特定的社会关系形态而流动的范式。它不是从先验构造的个体特征出发对自我行动和互动模式的探讨,而是从结构化的社会关系出发对自我行动和社会交往的研究。社会网络分析者认为,个人的社会生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我是如何与广泛的社会关系相联系的,社会等级(如阶层、种族)和社会群体(如团体、企业)可以通过考察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来最好的探索和分析。而另一方面,就社会交往而言,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收入、信仰和居住状况等个人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结构性的,它提供并限定个人社会交往的机会。

社会交往的趋同性原理指出人们倾向于与自己在各种社会经济地位特征方面类似的人发展密切关系。美国社会学家劳曼在美国大都市区域进行了两次成人非正式交往模式的大规模调查,结果发现两个在地位、态度、信仰和行为方面差异越大的人,越不可能形成密切关系(张文宏,2006)。社会交往的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个人通过计算投入

风险与产出效率之间关系的方式选择社会行动。理性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认为,社会关系、社会结构、集体决策和集体行为归根结底是个体进行成本效益分析追求最大功利的理性选择结果(科尔曼,1990)。荷兰社会学家范德普尔将理性选择理论运用到社会支持网的研究领域,推导出如下假设:人们建立和维持社会网络是通过评估所有可能的社会关系的成本和收益,从而选择能够付出最小成本且产生最大收益的个人关系。通过研究荷兰全国性的社会支持网调查资料,他发现,个人特征的趋同性越大,距离越近,时间越长,则交往机会越多,发展和维持关系的成本越低(Van der Poel,1993)。总之,个人特征会影响个人的社会关系,进而影响个人的社会网络结构。

在社会网研究领域,涉及调查对象个人特征对社会网络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很多。个人特征主要涉及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收入和社会分层等;社会网络结构主要涉及社会网络资本中的几个概念,包括网络规模、网络紧密度、网络趋同性、网络异质性和网络关系等。国内外有关的研究结果总结如下:

收稿日期:2009-12-20

作者简介:1.李汉宗(1981-),安徽阜阳人,武汉大学社会学系2008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生活质量和经济社会学;2.贺寨平(1965-),天津师范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04CSH010)的部分成果。

性别与社会网络结构。费舍尔的研究表明,女性和男性的网络规模没有显著差别,但女性的社会支持网中有更多的亲属,而男性的则含有更多的非亲属,特别是同事(Fischer,1982)。摩尔的研究进一步探讨了造成男女个人网模式差异的结构性因素,他发现,在控制与就业状况、家庭以及年龄相关的变量后,男女之间个体网的大部分差异减少甚至消失,不过女性的个人网中亲属居多这一点始终没有改变(Moore,1990)。而阮丹青等人的1986年天津调查的结果是:男性的讨论网成员中同事和其他非亲属关系较多,女性的讨论网成员中,亲属要大大多于男性的讨论网。在非党员中,男性的网络成员中党员和领导要多于女性。天津居民网络的另一特点是:男性的讨论网中异性的比例要低于女性的讨论网中异性的比例。在控制其他个人特征以后,除了工作关系以外,以上提到的其它网络特征仍然具有显著性。也就是说,即使在男性和女性具有相同社会地位的时候,男性的网络中仍然含有较少的亲属,较多的党员和领导,较少的跨性别的关系。总之,性别对于社会网络结构具有独立的影响(Ruan,1993)。

年龄与社会网络结构。根据全美综合调查,马斯丹的分析结果是,年龄越大,网络规模越小,青年人和中年人较之于老年人具有更大的网络规模;年龄与网络规模存在显著的负相关(Marsdan,1987)。阮丹青在天津调查发现,年龄与网络规模之间没有显著关系;年龄越大,职业趋同性越低;年龄与网络异质性之间存在曲线关系,中年人的网络成员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职业异质性比青年人和老年人都高。(Ruan,1993)。贺寨平在山西调查中发现,老年支持网具有网络规模小、网络紧密度高、网络趋同性高、网络异质性低的特点;网络关系主要是亲属关系;网络成员与调查对象之间具有很强的关系;交往频繁且空间接近度高(贺寨平,2004:210)。

婚姻状况与社会网络结构。费舍尔和韦尔曼的研究发现,已婚者与亲属和邻居的联系较多,而未婚者与非亲属和非邻居的联系较多;家庭中有未成年的孩子会限制各种社会关系的建立,尤其会减少与既非亲属又非邻居者的联系(Fisher,1982;Wellman et al,1991)。贺寨平在山西调查表明,已婚者的网络紧密度高于未婚者的网络紧密度,而且已婚者的老年支持网的亲属比例较高,性别趋同性较低,年龄和婚姻状况的趋同性较高,性别和教育程度的异质性较高,婚姻状况的异质性较低(贺寨平,2004:144)。

教育程度与社会网络结构。坎贝尔等人发现,北加利福尼亚社区居民的教育程度与性别和职业趋同性之间存在低度的正相关(Cambell et al,

1986)。马斯丹在全美综合调查中发现,网络规模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网络紧密度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而降低;教育程度高的调查对象倾向于具有较高的性别和年龄异质性,且更可能与非亲属来往(Marsdan,1987)。阮丹青天津调查发现,教育水平与网络规模、性别异质性和职业异质性呈正相关(Ruan,1993)。

职业、收入、社会地位与社会网络结构。坎贝尔等人发现家庭收入与性别和职业的网络趋同性存在低度的正相关(Cambell et al,1986)。阮丹青在天津调查表明,收入与网络规模和职业异质性呈正相关,工人较之于其他职业的人具有较高的性别和职业趋同性(Ruan,1993)。换句话说,在天津,社会地位越高的人组内选择的网络趋同性越低,多组选择的网络异质性越高。贺寨平在山西调查发现,家庭人均收入越高,老年支持网的紧密度越低,教育程度异质性越高(贺寨平,2004:139)。社会地位主要通过教育程度、收入和职业三项指标来衡量。博特在研究中发现,属于劳动阶级的人们较之于社会地位较高者更愿意与亲属来往(Bott,1957)。费舍尔和马斯丹在全美综合调查数据中均发现,网络成员的亲属比例与调查对象的社会地位呈负相关。在对底特律地区调查数据分析后(Fischer,1982;Marsdan,1987)。费舍尔认为,社会网中亲属比例与调查对象的社会地位呈负相关也许只是说明,社会地位高的人并不缺乏亲属关系,只是他们的社会交往更具有自主性和选择性。在全美综合调查中,费舍尔等人还发现,社会地位高的调查对象最好的朋友与其在职业、教育程度、经济状况、种族和年龄上极其相似,即社会地位与网络趋同性之间存在正相关(Fischer,1982)。在对北加利福尼亚社区调查资料的分析过程中,坎贝尔等人发现,社会支持网规模与社会地位存在正相关,网络紧密度与社会地位存在负相关(Cambell et al,1986)。他们还分析了底特律调查数据,结果发现,社会地位高的调查对象倾向于具有职业声望各异的朋友(Cambell et al,1986),这与费舍尔等人的发现存在相互矛盾,这种矛盾可能是由于调查中的网络规模较小所致。总之,个人的社会地位越高,其网络资源越多,社会地位高的人通常维持着成员数目多、联系松散且异质性较强的社会支持网。

以上结果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一般人口个人特征对社会网络结构影响的研究,而关于贫困人口这一特殊群体的个人特征对社会网络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之前还没有。进入21世纪,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等体制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所产生的贫困人口构成了中国城市贫困人口的主流,占到城市贫困人口的一半以上。城市贫困人口的自我

支持能力薄弱,文化程度不高,工作条件较差,社会地位较低,他们的生存状况成为城市发展必须面对的社会问题。研究城市贫困人口个人特征对社会网络结构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那么,城市贫困人口这一独特群体的个人特征对社会网络结构的影响又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与一般人口是否存在差别呢?

二、研究设计、基本变量和研究假设

(一)研究设计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对天津市贫困人口的多段抽样。研究总体为天津市6个城区中所有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家庭,^①其中包括63个街道,下设1,096个居民委员会。抽样步骤如下:(1)在天津市6个城区中随机抽取12个居民委员会;(2)在每个居民委员会中随机抽取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约45户家庭;(3)在每个家庭中选取成员年龄在15周岁及以上,并且生日最接近于调查的开始日5月1日的家庭成员为调查对象。调查时间是2007年5月1日—2007年7月1日。调查采取结构式访谈的方式进行,共发放并回收问卷540份,剔除一些回答不完全的问卷,共得有效问卷528份。

调查问卷中要求被调查对象填写本人的基本情况: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工作类别、职业等级、收入等。社会支持网的调查问卷是在荷兰社会学家范德普尔的问卷和贺寨平的山西调查问卷上删改而成,涉及情感支持、借款支持、就业支持和陪伴支持。

(二)基本变量

个人特征变量:(1)性别为虚拟变量,男性为1,女性为0;(2)年龄是调查时的实际年龄;(3)教育程度的测量是以调查对象自述的受教育年限为准;(4)婚姻状况的测量,原本分为四类:未婚、离异、丧偶和在婚,在进行回归时建立虚拟变量,令在婚为1,非在婚为0;(5)收入是指去年个人收入;(6)职业等级^②按照定距变量来处理,分类并赋值为:失业无业阶层=1;退休阶层=2;体力阶层=3;半技术阶层=4;技术阶层=5;普通阶层=6;中级阶层=7;高级阶层=8。

在多元回归中,由于网络规模对各种变量都可能产生影响,因此作为控制变量。

社会网络结构包括网络规模、网络关系、网络趋同性和网络异质性等。由于控制了网络规模,网络结构特征的测量,除网络异质性外都使用绝对数量。例如:网络趋同性的绝对数量是典型支持网中与调查对象具有相同个人特征的网络成员数量。在个人特征与网络关系构成以及网络趋同性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中,去除了网络规模为0的调查对象。而在个人特征与网络异质性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中,排除了网络规模小于2的调查对象。

具体的研究设计以及基本变量的定义和测量见笔者以往的研究(贺寨平,2004;贺寨平、李汉宗,2009)。

(三)研究假设

在社会交换论和社会互动论的基础上,根据国内外的研究发现,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个人的社会地位对网络资本有正向影响,即个人的社会地位对网络规模、网络异质性有正向影响,对网络趋同性呈负向影响。这可以通过交换论来解释,社会地位越高的人可以用于交换的资源(如时间、金钱、权力等)就越多,从而有越多的人愿意提供支持,因为这样可以获得回报。同时他们与别人建立关系的机会也较多,限制较少,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人,因而社会地位高的人通常维持着成员数目多、联系松散、异质性较强且亲属比例较小的一个社会支持网络。可见,职业等级较低的城市贫困人口的网络规模较小、网络趋同性较大、网络异质性较小。教育程度和个人收入与社会地位的影响是一致的,因为社会地位和职业等级就是通过这两个正向维度以及职业产生的。

同样的逻辑可以解释不同性别的人的网络的差别。众所周知,在人类几乎所有的社会类型中,妇女都居于相对于男性次要的地位,她们拥有的资源较少,因此给女性提供支持的人较少,即女性社会支持网的规模较小,同时网络趋同性较大,网络异质性较小,并且会有更多的亲属关系。

年龄差异对网络结构的影响是与个人的生命周期相联系的。一个人一生要经过上学、结婚、生子、退休等阶段,在不同的阶段上个人拥有的资源、面临的机遇、发展的关系都会不断变化,这些都会使个人具有不同的网络模式。一般而言,由于未成年人和老年人体力及经济状况的限制,社会影响力较小,其支持网的结构会呈现与青年人和中年人不同的形态,即网络规模较小,网络的趋同性较大而异质性较小,在网络构成上,血缘、地缘关系加大,业缘关系减小。可见,年龄与网络规模、网络异质性呈倒U型关系,与网络趋同性呈U型关系。就本研究而言,调查对象都是成年人,因此,年龄对网络规模、网络异质性有负向影响,对网络趋同性则呈正向影响。

婚姻状况对于社会网络结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关系构成上,在婚者与亲属和邻居的联系较多,而非在婚者与非亲属和非邻居的联系较多;家庭中有未成年的孩子会限制各种社会关系的建立,尤其会减少与既非亲属又非邻居者的联系。可见,在婚者的社会支持网中亲属和邻居关系较多,网络异质性较高,而工作关系和朋友关系较少,网络趋同性较小;其次是丧偶者;接下来依次是离异

者、未婚者。

但是,贫困人口在性别、年龄、地域、教育程度、收入和职业等个人特征上都有一定的分布特点,这种分布特点正反映出贫困人口所具有的共性。而我们所研究的正是城市贫困人口,在社会生活中,他们普遍处于社会阶层的底端:教育程度、个人收入和职业等级普遍偏低且样本异质性较小(贺寨平、李汉宗,2009),即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他们能够用于与他人交换的个人资源比较缺乏,承担风险的能力较差。因此,与一般人口的个人特征相比,城市贫困人口的个人特征对社会网络结构的影响会偏低,体现出一定的特殊性。

三、研究结果

由于现实社会中各种因素总是同时作用的,我们在数据处理上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网络规模等作为控制变量,以考察城市贫困人口特征对社会支持网的独立影响。我们的主要目的在于探索调查对象的教育程度、收入以及职业等级对社会支持网的影响,而性别、年龄及婚姻状况对社会支持网的影响则主要用于与其他研究之间的参照对比,以增添研究的广度和说服力。

(一)城市贫困人口个人特征与社会支持网的关系构成。如表1回归分析结果所示,在纳入其他变量之后,城市贫困人口个人特征对网络规模没有显著影响;网络规模对各种网络关系都有非常显著的影响;性别对亲属关系、朋友关系有显著影响,对邻居关系和工作关系没有显著影响;年龄对朋友关系有显著影响,对其他关系类型没有显著影响;婚姻状况对工作关系有显著影响,对其他关系类型没有显著影响;职业等级对工作关系有显著影响,对其他关系没有显著影响;教育程度和个人收入对各种网络关系都没有显著影响。

可见,在天津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中,网络规模不受个人特征的影响;网络规模越大,各种网络关系均会增多;男性的朋友关系较多,女性

表1 城市贫困人口个人特征对网络规模和网络关系影响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自变量	网络规模	亲属关系	邻居关系	工作关系	朋友关系
性别	-0.039	-0.191*	-0.087	0.047	0.182*
年龄	-0.013	0.007	0.003	0.001	-0.007*
教育程度	0.002	0.004	0.006	0.0003	-0.009
婚姻状况	-0.094	0.128	-0.054	0.082*	-0.108
收入	0.00004	0.000001	0.000004	0.000007	-0.000001
职业等级	-0.124	-0.078	0.015	0.055***	-0.030
网络规模	——	0.550***	0.132***	0.045***	0.244***
常数	3.537***	0.108	-0.199	-0.270	0.150
R2	0.019	0.511	0.118	0.091	0.259

*p<0.05, **p<0.01, ***p<0.001

注:a.表中各值为非标准回归系数;b.“——”表示不存在。

的亲属关系较多,男性与女性在邻居关系和工作关系上没有显著差别;年龄越大,朋友关系越少;在婚者比非在婚者有更多的工作关系,而两者在亲属关系、邻居关系和朋友关系上没有显著差别;职业等级越高,工作关系越多;教育程度和个人收入对各种关系类型均没有影响。

(二)城市贫困人口个人特征与网络趋同性。如表2回归分析结果所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性别对性别趋同性、工作类别趋同性有显著影响,对其他网络趋同性没有显著影响;年龄对年龄趋同性有显著影响,对其他网络趋同性没有显著影响;婚姻状况对性别趋同性和年龄趋同性皆有显著影响,对其他网络趋同性没有显著影响;职业等级对工作类别趋同性有显著影响,对其他网络趋同性没有显著影响;网络规模对性别趋同性、年龄趋同性、收入分层趋同性、工作类别趋同性和职业等级趋同性皆有显著影响;教育程度和个人收入对网络趋同性没有显著影响。

可见,在天津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中,男性的性别趋同性和工作类别趋同性小于女性,而两者在其他网络趋同性上没有显著差别,即女性有更多的与自己性别相同和工作类别相同的网络成员;年龄越大,年龄趋同性越小,即年龄越小,社会支持网中就有越多与自己具有相同年龄区间的网络成员;在婚者的性别趋同性小于非在婚者,在婚者的年龄趋同性大于非在婚者;职业等级越高,工作类别趋同性越小;网络规模越大,性别趋同性、收入分层趋同性、职业等级趋同性越大,而年龄趋同性和工作类别趋同性越小;教育程度、个人收入对网络趋同性的影响不显著。

(三)城市贫困人口个人特征与网络异质性。如表3回归分析结果所示,在控制了性别、教育程度、网络规模等变量之后,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对网络异质性均没有显著影响;个人收入对性别异质性和年龄异质性有显著影响,对其他网络异质性没有显著影响;职业等级对收入分层异质性有显著影响,对其他网络异质性没有显著影响;网络规模对年龄异质性、收入分层异质性、工作类别异质性和职业等级异质性均有显著影响,对性别异质性没有显著影响。

可见,在天津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中,个人收入越高,性别异质性越小,年龄异质性越大,即随着个人收入的增加,网络成员之间的性别差异减小,而年龄差异增大;职业等级越高,收入分层异质性越大;网络规模越大,年龄异质性、收入分层异质性、工作类别异质性、职业等级异质性越大。

四、总结与讨论

通过以上对天津城市贫困人口个人特征对社会网络结构影响的基本情况的描述,我们首先从

社会网络分析的角度总结出以下几点:

1. 性别与社会网络结构 在天津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中,“女性多于男性的亲属关系,男性多于女性的朋友关系;女性的性别趋同性和职业趋同性高于男性”得到证实。但是,性别对网络规模、网络异质性以及其他网络关系和网络趋同性的影响并不显著。

2. 年龄与社会网络结构 在天津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中,年龄越大,朋友关系越少。但是,年龄对网络规模、网络异质性以及其他网络关系和网络趋同性没有显著影响。与假设相悖的是,年龄越大,年龄趋同性越小。

3. 婚姻状况与社会网络结构 在天津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中,“在婚者有更多的工作关系;在婚者的性别趋同性低于非在婚者”得到证实。但是,婚姻状况对网络规模、网络异质性以及其他网络关系和网络趋同性没有显著影响。与假设相悖的是,在婚者的年龄趋同性高于非在婚者。

4. 教育程度与社会网络结构 在天津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中,教育程度对网络规模、网络关系构成、网络趋同性和网络异质性皆没有显著影响。

5. 收入与社会网络结构 在天津城市贫困人口

表2 城市贫困人口个人特征对网络趋同性影响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趋同性				
	性别	年龄	收入分层	工作类别	职业等级
性别	-0.191*	0.102	-0.135	-0.255*	-0.082
年龄	-0.003	-0.016***	0.006	0.007	0.0008
教育程度	0.011	0.007	0.017	0.017	-0.006
婚姻状况	-0.297***	0.292**	0.130	0.110	-0.110
收入	0.00001	-0.000006	-0.00001	0.000006	0.000002
职业等级	0.021	0.049	-0.005	-0.399***	-0.018
网络规模	0.609***	-0.410***	0.318***	-0.460***	0.220***
常数	0.039	0.466	-0.306	0.456	0.145
R2	0.631	0.444	0.017	0.453	0.175

表3 城市贫困人口个人特征对网络异质性影响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异质性				
	性别	年龄	收入分层	工作类别	职业等级
性别	0.017	-1.331	-0.0001	0.036	0.011
年龄	-0.001	-0.081	-0.001	0.001	-0.001
教育程度	-0.002	0.284	-0.006	0.002	0.002
婚姻状况	0.037	-0.896	0.013	-0.041	-0.048
收入	-0.000006*	0.0003*	-0.0000006	0.0000009	0.0000001
职业等级	-0.003	-0.702	0.030*	0.022	0.003
网络规模	0.022	0.610*	0.053***	0.063***	0.065***
常数	0.330**	12.400**	0.248*	-0.016	0.269*
R2	0.055	0.070	0.145	0.159	0.201

*p<0.05,**P<0.01,***P<0.001

注:表中各值为非标准回归系数。

口的社会支持网中,“个人收入越高,年龄异质性越大”得到证实。但是,个人收入对网络规模、网络关系构成、网络趋同性以及其他网络异质性没有显著影响。与假设相悖的是,个人收入越高,性别异质性越小。

6. 职业等级与社会网络结构 在天津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中,“职业等级越高,工作关系越多,职业趋同性越低”得到证实。但是,职业等级对网络规模、网络异质性以及其他网络关系和网络趋同性没有显著影响。

概而言之,在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中,“个人特征对社会网络结构的影响程度偏低”得到证实,与一般人口相比具有很大的差别:(1)性别、年龄和职业等级对网络规模和网络异质性均没有显著影响;(2)教育程度对网络规模、网络关系构成、网络趋同性和网络异质性均没有显著影响;(3)婚姻状况对网络规模、亲属关系和网络异质性没有显著影响;(4)个人收入对网络规模、网络关系构成、网络趋同性均没有显著影响;(5)在婚者的年龄趋同性高于非在婚者;(6)个人收入越高,性别异质性越小;(7)个人特征对社会网络结构变量的影响在其他许多方面也不显著。对于这种不同于甚至有悖于一般人口状况的结论,我们主要作以下解释:1)从社会阶层和社会结构来分析。城市贫困人口处于底端的社会阶层,教育程度、经济收入和职业等级普遍偏低,即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他们能够用于与他人交换的个人资源比较缺乏;再加上社会结构的固化和社会转型的冲击以及社会保障制度对贫困人口保护和保护的缺乏,以至于城市贫困人口少有走出自己社会交往圈子的机会,很难进入较高社会阶层的社会交往领域。根据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成果,网络规模越大、网络趋同性越小、网络异质性越大,则社会资本越多(边燕杰,2004),而社会资本反映社会支持网提供社会支持的能力。由于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规模较小,而网络趋同性较大,网络异质性较小,因此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网络资本较少,提供社会支持的能力较差。或者说,城市贫困人口的个人特征对社会支持网的影响程度偏低正反映出城市贫困人口个体之间的差异以及在获得社会支持和帮助方面的差异较小,即他们的社会网络资源普遍较少,他们从社会支持网中获得的社会支持和帮助普遍较少。就城市贫困人口而言,社会结构的存限制了交往的范围,从而,使社会网络结构趋于单一。网络分层与社会分层的复合共同加深了城市贫困人口的贫困处境。2)从社会交往模式来分析。调查对象与网络成员之间的社会交往模式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家庭交往和个人交往。其中,家庭交往是指调查对象与网

络成员之间的交往是建立在家庭关系的基础之上;个人交往是指调查对象与网络成员之间的交往是建立在个人关系的基础之上。在我们的研究中,家庭交往关系主要包含两种关系:亲属关系和邻居关系,个人交往关系主要包含四种关系:工作关系、朋友关系、同学关系和其他非亲属。在天津城市贫困人口的典型支持网中,家庭交往关系占所有关系的84.2%,而个人交往关系仅占15.8%(贺寨平、李汉宗,2009)。另一方面,在典型支持网中,天津城市贫困人口的网路规模很小(Van der Poel,1993;贺寨平,2004;洪小良,2004;等),只有2.55。概而言之,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交往主要是家庭交往,家庭交往规模为2.14,而个人交往很少,个人交往规模仅有0.41。也就是说,城市贫困人口社会支持网的规模较小且社会交往模式单一,于是,就城市贫困人口而言,个人特征对社会网络结构的影响也就趋于消失。3)从研究本身来分析。在本研究中,调查对象全是城市贫困人口。而城市贫困人口是城市中的复合性弱势群体:私人资本贫乏,社会网络资本薄弱,社会保护缺失。他们在性别、年龄、地域、教育程度、收入和职业等个人特征上存在一定的分布特点,具有集中趋势,他们普遍处于社会阶层的底端,样本异质性较小。他们的社会支持网在整体上的差异较小,社会网络结构趋于单一(贺寨平、李汉宗,2009)。因此,与一般人口相比,城市贫困人口特征对社会支持网的影响程度则会偏低,从而进一步导致“城市贫困人口特征对网络规模没有显著影响、教育程度对社会网络结构变量没有显著影响以及其他诸多城市贫困人口特征对社会网络结构的大部分变量没有显著影响”。

当然,我们的解释只是提供了一种途径。在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中,就如“在婚者有更高的性别趋同性”、“个人收入越高,性别异质性越小”等特别反常的结果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去验证,并探索其中的原因所在,以做出更为科学、合理的解释。

(本文曾获罗家德教授、张文宏教授和赵延东研究员的评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注释:

①国家统计局、国家民政部所谓的贫困人口就是低于社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人口,在本研究中采取此比较公认的定义。

②根据边燕杰、李培林、李路路、许欣欣等人的社会分层研究,在本研究中,我们把职业等级分为八个阶层,其中包括:无业失业阶层;退休阶层;体力劳动工人、以体力劳动为主的有技术的农民工、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农民工(包括建筑工地与餐馆)、保姆,简称体力阶层;半技术体力工人、售货员、列车员以及其他各类服务人员等,简称半技术阶层;技术工人、个体户或自我雇佣人员(自

由职业者),简称技术阶层;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一般工作人员、一般技术人员、小雇主、小饭馆老板、小杂货店老板、企业一般管理人员、体力劳动者的主管、秘书、中小学教师等,简称普通阶层;中低级(处级和科级)政府官员或其他有行政级别的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经理、项目主管人员、技术人员的主管、拥有较少雇工的私营企业主、较小企业的董事、大学教师、主治医师、包工头等,简称中级阶层;高级(司局级)政府官员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企业总经理、大企业的董事等拥有较多雇工的私营企业主、著名注册会计师、著名律师、表演艺术家等,简称高级阶层。“简称”以便于描述和说明。

参考文献:

- [1]边燕杰等.中国城市的职业、阶层和关系网[J].开放时代,2005,(4):98-118.
- [2]国家民政部.2005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网,2006-05-07.
- [3]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6)[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
- [4]贺寨平.社会网络与生存状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 [5]贺寨平,李汉宗.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研究——以天津为例[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33-37.
- [6]洪小良.城市贫困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与社会支持[D].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
- [7][美]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M].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
- [8]李培林等.当代中国社会分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 [9]张文宏.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和社会网络[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10]Bott,Elizabeth,(1957)1971,Family and social Networks(2nd ed).New York:Free Press.
- [11]Canpbell,K.E.,et al.1986,Social Resources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Social Networks 8.
- [12]Fischer,Claud S.1982,To Dwell among Friends: Personal Networks in Town and Ci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3]Granovetter,Mark.1973.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78.
- [14]Marsden,1987,Core discussion networks of Americans.A.S.R.vol.52.
- [15]Moore,Gwen,1990,structural Determinants of Me's and Women's Personal Network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55:714-718.
- [16]Ruan,Danqing.,Social Network in Urban China, Doctorate Dissertation,Columbia University,1993.
- [17]Schweizer,Thomas et al.,1998.Personal Networks and Social Support in a Multiethnic Commun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J].Social Networks,20.
- [18]Wellman,B.et al.1991,Integrating Individual,Relational and Structural Analysis.Social Networks 13.
- [19]Van der Poel,Mart.,1993.Delineating Personal Support Network,Social Networks,15.

(编辑:井虹)